农村社区内在活力的营造机制研究 ——以台湾龙眼林社区为例

Research on Internal Energy Construction Mechanism of Rural Communities:
A Case Study on Longyan Lin Community, Taiwan

万成伟
Wan Chengwei

摘要: 基于台湾社区发展历程与经验认识, 提出农村社区内在活力的概念与分析框架, 从产业经济活力、社会文化活力、物质环境活力等“三股分力”进行了深入分析。在理论认识的基础上, 以台湾龙眼林社区为例分析了内在活力营造经验, 并总结对大陆农村社区内在活力营造机制的启示。

Abstract: Based on the development history and experience of Taiwan community, an analysis framework for rural community vitality is put forward in the paper, into which a profound analysis is conducted from three aspects: industrial economic vitality, social culture vitality and physical environment vitality. Besides, the paper explores the successful experience in building Longyanlin communities in Taiwan and provides some implications for internal energy construction mechanism of rural communities in Chinese Mainland.

关键词: 农村社区; 内在活力; 营造机制; 可持续发展; 台湾龙眼林社区

Keywords: Rural Community; Internal Energy; Construction Mechanism;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Longyan Lin Community of Taiwan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城镇化发展取得巨大成就, 城市发展欣欣向荣。然而, 许多农村社会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衰败景象, 包括基础设施落后、农民生活品质差、人口流失、高龄化严重、自治不彰等。为改变农村发展面貌, 2005 年以来先后提出新农村、农村社区、城乡社区、美丽乡村等一系列的农村建设发展政策, 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农村发展环境。但长期以来, 农村规划建设以物质空间规划设计为重点, 过于强调农村经济功能的独立性和重要性, 而忽视了农村的社会、文化、生态功能及公众参与和对使用需求的呼应^[1], 农村社区缺乏整体的内在活力培育, 导致发展动力不足而失去竞争力, 不断走向衰败没落。那么, 农村社区的内在活力是什么呢? 如何对农村社区内在活力进行剖析? 农村社区为什么需要内在活力营造? 又该如何营造内在活力? 本文借鉴台湾社区营造经验, 以龙眼林社区为例对此进行阐述, 并总结其对大陆农村社区的启示。

1 农村社区营造及其内在活力的认识

1.1 农村社区

农村社区是相对于城市社区而言的, 也可称为乡村社区。根据同济大学杨贵庆教授的定义, “农村社区”是指“农村地域一定规模人群的社会生活的共同体”, 包括四方面内涵: (1) 农村地域, 即社区营造的物质空间环境范围; (2) 合理的社区规模人群; (3) 所在地域内所有生产、生活的社会活动; (4) 有着共同利益的共同体精神^[2]。社区不等同于一个空间或者行政区概念, 是一个更加偏向社会学属性的空间范畴。在做社区规划建设时, 通常需要一个明确的空间界限, 以便规划要素关系的组织与表达。因此, 一般把一个功能完善、社会结构稳定、有着共同价值渊源的村庄、集镇、街道、住区等明显的单元当作社区看待。在台湾, 一般以村、里为社区单元。

1.2 台湾社区营造

社区营造是社区发展充分运用社区内的各种资源条件, 凝聚社区共识、改善生活环境、延续文化精神、重塑社区活力的自发过程, 使得社区主体充分参与到影响其生活的社区发展过程中, 实现在人、文、地、产、景五大方面的可持续发展的行动^[3]。社区营造是一个持续发展过程, 是为培育社会可持续发展活力的一种有组织、有目的的有益行动。

作者: 万成伟,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城市规划与管理系博士研究生, 规划师。
824409159@qq.com

台湾经历了从社区发展到社区总体营造的漫长过程。台湾的社区发展始于光复初期,光复后的台湾经济快速增长,城镇化进程加快,社会多元化趋势明显,同时伴随生态破坏、地方特色消失、农村衰败、社会关系疏远等问题,由此催生了社区发展。1960—1970年代,政府提出一系列社区发展促进计划,着重从基础工程建设、生产福利建设、精神伦理建设三方面制定工作方案,旨在改变居民生产、生活环境的品质。1980年代后期,政治解除戒严后,民间团体力量爆发,草根民权起势,加上因发展过快带来的环境问题引发社会生存反思,一场保卫居民生存权的自救运动、增强社会认同的自我保存运动以及改善生活环境品质的改良运动风靡全岛^[4]。为缓和社会矛盾,1994年政府提出“社区总体营造”计划,力图通过政府引导,充分发挥民间的文化创造与社会能动性,在城市与乡村,从生活环境、美学品味、社区秩序、产业型态等方面带来新福利,为台湾基层社区塑造全新的风貌。1999年的9·21大地震凝聚了重建振兴的社会共识,促进了政府部门与社区组织、专业的非营利组织及其他民间团体的合作,扩大了社区营造的影响力^[4],丰富了社区营造的方式与内容,把社区总体营造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度。2000年后,政党轮替,面对全球化、自然灾害、产业结构转型、高龄化社会等新挑战,本土化发展为主的理念占据上风。在新政府推动下,“社区营造”上升为“全台”计划,从产业发展、社福医疗、社区治安、人文教育、环保生态、环境景观等全面发展的《台湾健康社区六星计划》,以及包含原住民新部落运动、文化资源创新活用、社区风貌营造、内发型地方产业活化等七项子计划的《新故乡社区营造1期计划》相继出台,使得社区营造真正成为自下而上的家园建设模式。2008年再次“执政”的国民党发起“磐石行动与创意生活文化圈计划”——不仅强调社区的自我发展与学习,更注重协助其他社区能力的培育;同时社区扩大连接所在周边的人、事、物,寻求新突破;社区营造演化为“社群”营造、“社会”营造的新局面,力图实现社区、社会的永续发展。

台湾的农村社区发展基本与城市社区同步,但因其较为独立的地理单元属性及发展特殊性,社区营造更强调其产业经济、社会文化、物质空间的均衡发展,注重培育完整的社会功能。为振兴农村,台湾各“部会”多年来积极推动农村社区可持续发展专项计划,期许在环境、社会及经济三个层面的连接上建构可持续社区发展^[5]。农村社区更新的目的包括:改善农村的生产条件与生活环境,谋求城乡的均衡发展,减少农村人口的外流,加强农村特质的维护,保存具历史价值的农村文物与农村风貌,赋予老旧住宅及具历史意义建筑物新生命,维护村庄的自然生态与景观,增进农村在居住品质以及休憩价值方面的吸引力^[6]。新世纪后,可持续发展理

念成为发展指导思想,乡村社区强调自下而上式的本土化发展,在自然环境、经济效益、社会发展及文化承传等四方面均衡进行,寻求人文地产业景的协同发展,力求在生产、生活、生态上取得均衡^[7]。

经过50多年的发展,台湾社区营造取得了巨大成就,在营造机制、内容、目的上不断与时俱进。营造机制上,从初期社区由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社区发展”模式,转为如今政府、社会、企业、居民协作、积极参与的自下而上的“社区总体营造”;营造内容上,从单纯的空间物质环境品质提升,转为鼓励居民自治、培育社区共同体精神、发展多元经济以及社会文化传承与创新的永续活力营造;营造目的上,从提高交通、公共服务设施、工作环境等生产、生活环境品质,转为培养社区共识,社群营造、社会营造的共同生命体塑造。总体看来,这种社区营造模式与内容的转变是为了在产业经济、社会文化、物质空间上架构一个良性互动平台,尤其是在农村社区,三者的统一性更为凸显、牢固,以求塑造一个整体式均衡发展框架,营造更为健康稳定的内在活力。这不仅是适时而为的举措,更是社区自我生存的应对。

1.3 社区内在活力的内涵与意义

1.3.1 内涵

通过台湾社区营造的经验可知,社区规划不仅是物质空间环境的设计与发展,而且包含产业经济、社会文化两方面的整体发展。在农村社区中,产业经济、社会文化、物质空间三者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共同作用,交融形成“一股合力”不断支撑、推动社区发展,三者不仅是农村社区的构成主体,而且映射出社区整体性发展的健康状态,是一种具体又高度抽象的真实存在体。这股由三者共同形成的合力就是社区的内在活力。

农村社区的内在活力具有三方面的特征:其一,内在活力营造是社区生产、生活活动的总和、构成农村社区发展的基础并提供发展动力来源,是社区生命力的体现;其二,内在活力是农村社区社会活动的衡量维度,能反映出社区发展是否健康有序;其三,内在活力是由社区产业经济活力、社会文化活力、物质空间活力“三股分力”共同组成,是一股由三者构成的整体性、综合性、集成性的合力,三者缺一不可。产业经济为社会文化与物质空间的发展提供资金支持,物质空间是社会文化与产业经济活动的空间载体,而社会文化是产业经济与物质空间的内涵所在,三者在社区营造中各自发挥作用,相互支撑,共为一体(图1)。

1.3.2 意义

剖析农村社区发展活力理念的意义即回答了农村社区为

什么需要内在活力,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农村社区活力有助于更为深入地研究农村问题,把脉农村发展方向。相较于城市,农村是一个独立而弱小的发展单元,社会功能简单,对农村在规划维度的认识往往侧重于某一方面,使得科学性不足。内在活力的提出提供了一个全新思维,有助于找到更深入、全面的分析方法,从而更好地认识农村面临的问题与发展规律。二是内在活力有利于树立农村整体发展观。内在活力,从产业经济、社会文化、物质环境三大方面为农村社区营造建构了一个系统的规划建设管理框架,无论是从社区“疾病的诊断”,还是对于“治疗方案”以及后期持续的“活力维系”都提供了一个整体性的方案体系,系统发展观的树立,有助于更为全面地解决农村发展问题,培育持续、健康发展活力。三是内在活力有利于找到农村社区营造的抓手。内在活力从产业经济、社会文化、物质环境三方面明确了社区营造的实质内容与方向,为社区营造找到了具体目标,有助于社区营造政策的制定与方案落实。

台湾的农村社区营造就是充分培育、挖掘内在活力的过程,这种方式在1994年社区总体营造计划后全岛所尊崇的自下而上式规划中得到充分印证;而在1999年集集大地震后全民行动共同重建美好家园过程中,社会力量充分调动,社区活力得到最大释放,社区营造进入空前发展推广期,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成功案例,其中南投县龙眼林社区就是最好的典范之一。

2 龙眼林农村社区内在活力营造机制探究

2.1 龙眼林社区营造

2.1.1 背景介绍

龙眼林社区位于台湾南投县中寮乡的北部区域,由三个村庄组成,距离南投市约10 km,面积约2 700 hm²,核心聚落约740人(图2,图3)。选择龙眼林社区为案例的原因有二。

(1) 该社区是台湾农村社区总体营造的一个成功典范。1999年龙眼林开始社区总体营造初始,正值台湾全面推行

社区营造的高峰期,其成功的营造政策与模式不仅是在政府的发展理念与技术指导下推动进行的,在汲取了其他社区发展经验的同时还有自我创新。

(2) 该社区的发展背景与大陆多数农村具有许多相似点,借鉴意义大。兴盛于日治时期的龙眼林社区,因香蕉、太白粉等传统农业资源优势,商业繁荣,人丁兴旺,社区公共服务、交通、市政等基础设施完善,社会和谐,一度成为南投发展重镇。1945年光复后不久,随着台湾城市化快速发展,全球贸易频繁,台湾发展重心转移到城市,农村发展优势不再。在此背景下,龙眼林社区的传统产业慢慢走向衰败,社区人口外流、老龄化、少子化、社会关系疏离、公共环境简陋、地方文化传承受阻、村治不彰等现象严重,社区由繁荣的产业重镇变成衰败萎缩的没落之地。不难发现,其演进历程也正是近年来大陆广大农村的现实写照。

2.1.2 社区发展

1999年集集大地震重创台湾中部,位于震中的龙眼林社区大多数房屋、道路、市政基础设施等受损严重。为恢复正常的生活,社区在社会各界力量的帮扶下开始重建,由此迎来发展新时期。

根据龙眼林社区总体营造历程,灾后重建可被分为三个阶段(表1)。重建期初始,为高效运转、使用社会捐赠物资,发挥社区居民团结协作精神,由村长牵头成立了以社区福利协会为主的多种团体组织。协会专注于社区发展计划编制与建设,并引领居民协同社会援建组织积极重建住房、道路、市政基础设施等,快速地恢复了社区的正常生产生活,奠定了社区稳步发展的基石。2002年重建基本结束,赈灾帮扶组织相继淡出,社区建设资金缩水,发展受困。为寻求长久发展,2005年由协会组织制定产业经济发展计划,同时成立不同类型的产业营销组织,推动香蕉、荔枝等特色农作物、农产品加工,旅游观光,服务等业态同步发展,形成多元经济产业链,以此活化社区产业经济、稳定社区居民收入来源,并带动社

图1 社区内在活力解析图示

图2 社区在南投县区位图

图3 社区用地性质图

资料来源：龙眼林社区农村再生计划

区社会文化与环境建设的同步发展。2010 年进入成熟期，社区提出“生产、生活、生态”协同发展目标，并编制了农村再生计划。计划提出完善“社区支持农业体系”(CSA)，加强传统文化传承与社区新文化的发展，采取美化庭院、公共环境以及完善基础设施等措施，取得积极成效。经过 10 多年的社区总体营造，如今龙眼林社区内在活力十足，发展欣欣向荣，成为台湾农村社区营造效仿学习的典范。

2.2 龙眼林社区内在活力营造机制分析

龙眼林社区震后再生，不仅在于抓住了重建机遇，更重要的是通过社区总体营造，凝聚社区共识，形成稳定的发展组织，并结合自身农业、生态等特色优势，创新丰富产业形态，激发经济活力，同时强调村庄生活、生产环境更新、生态保育与社区人文的同步发展，形成较为均衡的产业经济、社会文化、物质空间发展框架，保障了内在活力的持续维系，推动了社区健康长久发展。

2.2.1 产业经济活力营造

(1) 立足地方农业、发展多元经济。为缓解市场波动对传统农业价格的影响，提升产业竞争力，社区福利协会每年以高于市场价的价格统一收购农民种植的龙眼、荔枝、乌梅等农作物，利用自己研发的农产品加工技术生产出附加值高的新型农产品，并融入地方文化元素包装出售，所获盈利再

反哺于社区居民的福利、社区环境建设，受益后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更高，产出更大，从而形成良性循环。另外，社区利用生态资源和乡土景观积极发展农业观光、休闲、体验旅游，带动社区第三产业发展，形成多元业态格局，保障了稳定的经济活力。

(2) 编制产业计划、建构 CSA。社区每隔 3~5 年会根据社区产业经济发展与市场需求状况进行全面检讨，并编制新的产业发展计划，不仅明确不同时期的发展目标，而且注重适时调整产业结构，引入新的生产加工技术，以此增强社区产业经济竞争力。由社区福利协会成立产业发展营销组负责制定社区产业经济发展、销售计划；同时，为保障农产品生产、销售出路，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实现农户增收，社区还与部分城市社区、周边社区积极合作，建构有效的 CSA。

产业经济的繁荣发展带动了社区人文的进步与物质环境的改善。自从杨梅等特色农产品、旅游等业态不断丰富，居民收入增加，就业空间扩宽，吸引了在外居民的回流，福利协会产业经营获利又反哺于社区教育、福利、文化组织的建设，同时成立的公共基金又助于修缮社区旅游服务等设施，美化公共环境。可见，龙眼林社区丰富的产业体系为社区的社会文化发展与环境更新提升提供了经济保障，奠定了发展基础。

2.2.2 社会文化活力营造

(1) 培育地方组织，倡导自下而上。地震重建后，由村长牵头成立了以本地居民为班底的社区福利协会，协会负责社区建设资金募集与运转、制定社区发展计划，并为社区居民发表意见提供平台，成为社区营造的组织者与主要参与者（图 4）。因协会倡导公开透明与民主体制，并且通过产业营销为社区带来红利，得到了居民的认同与支持。同时，社区还成立志工（即志愿者）团队、产业发展协会、文化活动

表 1 龙眼林社区发展历程

发展阶段	面临的问题	解决措施	主要目标
灾后重建期 (1999—2001 年)	(1) 传统香蕉和种植等特色产业衰败、人口流失、老龄化、自治不彰等现象严重； (2) 地震重创，道路、公共设施、住房等受损严重，亟需重建	(1) 成立社会福利协会等民间机构，组织重建人力、物力资源； (2) 福利协会组织居民与援建组织共同编制灾后重建计划及各项计划； (3) 推行老人免费送餐计划等惠民措施； (4) 为当地居民培训辅导职业技能	恢复社区正常生产、生活；凝聚社区共识
发展期 (2002—2009 年)	(1) 赈灾援助组织相继淡出，社区发展资金缩水，面临生存危机； (2) 产业经济缺乏活力，人口不断外流； (3) 居民社区意识薄弱	(1) 延续并扩大以社区照顾为特色的社会福利机制； (2) 编制实施社区产业经济发展计划，发展多元经济，成立多种产业营销、发展组织； (3) 编制、实施“人、文、地、产、景”全面发展的《健康社区六星》计划	提升产业经济竞争力；完善社区福利机制；培育社区共同体精神
成熟期 (2010 年至今)	(1) “莫拉克”风灾等自然灾害侵袭； (2) 旅客容量增加带来环境冲击； (3) 局部建筑、场地破败、废弃	(1) 按照统一标准系统检讨社区发展； (2) 编制《龙眼林社区农村再生计划》，提出长远发展计划； (3) 完善“社区支持农业体系”(CSA)、推行“慢活”体验活动，丰富产业类型； (4) 社区“美化”运动	“生产、生活、生态”三位一体有机协调，实现社区可持续发展

图 4 龙眼林社区福利协会组织结构

资料来源：龙眼林社区福利协会官方网站

团队等组织,成为团结居民、培育社区意识的主要推手。社区营造以当地民间机构与社区居民为参与主体,政府、社会企业提供资金与技术支持,形成自下而上、多方参与的营建模式。

(2) 健全福利机制,注重人才培养。社区形成以老人送餐为特色,并辅以幼儿日托、老人活力站等多个福利项目,满足了社区居民不同需求;同时以社区福利的形象包装、销售社区农特产品,再以农特产品销售所得盈余投入社区福利发展,两者相辅相成,不但使得当地农民有稳定的经济来源,更建立了一套特有的自主运营机制^[8]。在人才培养上,通过教育弭平计划,提供了青少年平等学习机会;以社区学园、DIY 工作坊等实践活动为特色的学教平台培育了居民再学习的热情;对于社区营造专才的培养,福利协会采取老中青人员搭配模式,每年定期外出参访学习,以便掌握社区营造的最新趋势;此外,协会还采取优惠奖励政策吸纳有志青年来乡服务。

(3) 立足传统文化,发展社区新文化。一方面,社区设有文化活动室、成立了兴趣爱好小组,以更好传承发扬传统技艺、文化;另一方面,社区每年都会在传统节日组织各种节庆、宗教文化活动来加强居民的文化认同感,同时利用社区发生的重大事件纪念日举办常年性的文化纪念活动,如 9·21 地震纪念日、庙宇节庆、文化艺术季等,逐渐内化成社区新文化。新旧文化有机结合,助推社区形象提升。

社会文化活力的培育是整个龙眼林社区营造的灵魂所在。以社区组织、社区文化、社区人才、社区福利等为特征的社区意识与社区共同体精神培育成为社区营造的核心所在,为产业经济与物质空间发展提供无限的智力支持与创意源泉,是两者发展的出发点与落脚点。不得不提的是,社区福利协会作为社区的核心组织,在社区发展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贯穿社区的整个发展。

2.2.3 物质空间活力营造

(1) 完善基础建设,注重生态防护。一方面,借着地震重建机遇,不仅完善社区内外交通道路体系、增加路网密度、优化网络通信、提升市政工程质量,而且完善了社区活动中心、社区学园、便利店、幼稚园等服务设施,方便居民日常生活;另一方面,社区注重生态安全,不断实施生态保育与安全防护方案,如清理河道、保护培育生态湿地、在危害地段增设防护工程等。同时定期对各种设施维护修缮,以便持久安全使用。这些举措确保了社区发展过程中有完善的基础设施、良好的生态环境为支撑,为社区生产生活提供了坚实基础。

(2) 活化废弃空间,倡导低碳节能。首先,对管辖范围内的用地权属、边界进行数字化登记管理,明晰权责;其次,鼓励居民“认养”闲置的空地;通过功能置换、艺术设计等手段活化简陋、废弃、闲置的建筑与场地,创建成社区新的活力场所(图 5、图 6);第三,实行生活垃圾分类与无害化处理,鼓励太阳能、电能、天然气等低碳能源使用,对使用节能环保材料的居民给予奖励。

(3) 开展“美化”活动,提升环境品质。在环境美化上,由社区规划师、建筑师牵头组织社区居民共同参与小品环境设计与施工,提倡“谁家的院子谁打扫”,定期组织居民整洁、美化社区活动,确保公共环境与院落空间的干净、美观,为旅游发展创造良好条件。

不难看出,物质空间活力是整个龙眼林社区营造的基础,为产业经济与社会文化活力的培育提供了载体,并使得两者能以具体的物质形态呈现。公共设施的更新、展销场所的兴建、河道湿地的修复等生活、生产、生态空间的营建,不仅在人工与自然环境中提升社区的品质,更为社区产业经济营销、社会文化建设创造了条件,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让社区的内在活力得以真正体现。

图 5 整修后的社区广场

图 6 社区入口标识

2.2.4 小结

龙眼林社区营造过程强调产业经济活力、社会文化活力、物质空间活力的同步协调发展,注重整体性的内在活力培育发展。社会文化活力上,由乡贤精英牵头培育地方组织,鼓励居民积极参与社区建设,形成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相结合的参与机制,既注重对农民的教育培训与福利保障,又注重传统文化的弘扬与新文化的吸收;物质空间活力上,强调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生态环境、防护工程建设先行,注重社区美化,如公共空间的设计与废弃空间的整合利用;产业经济活力上,充分发挥地方资源优势,形成以特色农业与旅游业同步发展的多元经济。三者相互渗透、融合,共成一体,支撑起社区的发展。

3 龙眼林社区对大陆农村社区内在活力营造的启示

台湾因其成熟的发展背景与发展模式,在社区营造上取得了丰硕成果,虽然在体制、发展模式与阶段上有别于大陆,但是在社区内在活力的营造上有许多共通之处。总结来看,龙眼林社区营造对正处于新型城镇化、快速转型期的大陆农村发展有以下启示。

3.1 善于抓住重大事件与机遇,活用资源助力农村社区发展

龙眼林社区抓住并充分利用了灾后重建的社会人力、物力资源,通过协力重建,凝聚了原本涣散的社区组织,鼓舞了居民再造美好家园的热情与信心,奠定了重塑社区内在活力、实现再生发展的基础。对于我国普遍衰退、精英缺失的农村社区来说,在当下的市场经济时代,完全依靠自我更新发展实现繁荣非常困难,唯有借助外部力量,激发生态环境等资源优势,培育市场竞争力,才能赢得发展机遇。如近年我国实施的新农村、美丽乡村等行动计划,虽为农村发展带来巨大资金与政策支持,但当分摊到数以百万计的村庄时就显得杯水车薪,这就需要每个村善于借助援建、搬迁、项目进驻等重大事件,汲取各种内外部资源,转化为社区发展动力,实现催化发展。

3.2 坚持规划为先,统筹“三位一体”,为社区内在活力营造画好蓝图

龙眼林社区营造在不同发展期都有具体规划作为行动指南,规划主要由福利协会牵头组织,本地居民民主参与、共同协商,且规划注重可操作性,使得社区在“产业经济、社会文化、物质空间”三方面不偏不倚,保障了社区活力持续发展。虽然近年我国加强了乡村规划,已开始注重规划的重要性,但仍处于口号与形式层面,具体行动多难以实施落地,

亟待转型。新时期,我国农村发展应坚持规划先行,对社区内产业经济、社会文化、基础设施作好空间的统筹安排,合理利用社区内各种资源,为社区内在活力持续发展画好蓝图。根据国情,短期内农村社区规划仍由政府(乡镇级为主)主导统筹,但应积极吸纳、鼓励、支持乡贤直接全面参与;同时,要善于经营村民委员会这个议事平台,积极培养新型社区组织,构建多种参与渠道,使村民能充分有效地表达意见、发挥权利,参与到规划制定与实施中来,不断培育、增强社区居民共同参与意识,最终实现自己的社区自己规划与营造。

3.3 挖掘地方特色,发展多元业态,为社区产业经济活力发展找到动力

振兴活化乡村基础产业,乃是落实社区总体营造的原动力^[9]。无论是日本的“一村一品”,还是台湾的“一村一休闲”,都讲求依托地域的自身特点与资源禀赋,变资源优势为产业与品牌优势,使其逐步成为具有区域特色的产业链或产业集群。龙眼林社区的发展表明,社区发展在于对自我文化的认同及自我潜力的挖掘,充分发挥优势资源,从中汲取养分,跟上时代与市场需求,创造新型产业,实现社区经济发展与社区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依附地方文化培植起来的产业,有助于促进农村产业可持续发展,更易激发农村社区活力,留住在地人员;反过来,在地产品可以从心理层面增加居民对于社区的自信,有助于传承地方文化,衍生社区新文化^[3]。借助资源优势,发展农产品加工等延伸产业、乡村生态旅游业等多元经济,并以专业化、多样化营销,为社区内在活力营造提供稳定、宽阔的动力支撑。我国农村数量大、分布广、特色鲜明、文化丰富多元,以地方文化、地方特色为导向,培育多样产业,实现多元经济发展大有可为。

3.4 寻求多方协作,倡导共同参与,为社区社会文化活力发展提供保障

农村社区发展往往因政府财政支撑不足、专业人才匮乏,地方自治能力弱而难以为继。借助民间资本、非营利组织等社会力量,组建多样化的地方组织,发动社区居民参与社区营造、事务管理,形成自下而上与至上而下相结合的参与组织模式,不仅有利于增加社区建设力量,发挥各界资源优势,而且有助于培育社区共同体精神。良好的社区共同体精神又有利于居民积极参与社区事务、传承发扬社区文化,促进农村社区和谐发展。我国农村社会具有长期“自我治理”的社会基础,社区营造只需唤起农民长期受压抑的积极性,提供居民表达意见、参与社区营造的平台。同时,鼓励成立民间组织,引导企业等非官方机构参与社区营造,构建多方合作机制。社区营造一定要由本身做起,而且是自发性、自主性的;

政府的角色只是在初期提供各种诱因和示范计划,着力于理念的推广和经验的交流、技术的提供以及部分经费的支持^[3]。可见,充分发挥社会力量,实现多方合作,建构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参与机制,为社区社会文化活力发展提供保障,才能创造源源不断的内在活力。

3.5 加强基础设施,保育生态环境,为社区物质空间活力发展奠定基础

道路交通、市政设施、公共服务等基础设施与山、水、林地等构成的生态环境是社区物质空间环境的主要构成部分,也是社区居民生产、生活的物质保障,奠定了物质空间活力的发展基础。完善的基础设施为产业经济发展与社会文化发展提供物质支撑,创造出与城市发展均等的机会。良好的生态环境是农业之本,是农民的生存之本,保障农村社区有干净的土壤、洁净的水、清新的空气,不仅有利于农业生产,更有利于生活健康,成为农村最为宝贵的发展资源^[10]。农村社区往往面积较大,土地、植被、动物、水体等生态要素丰富,是我国生态基底主要构成部分,生态效益更为明显,不仅为农村生活、生产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基础,而且对保护全国生态平衡具有重要意义。可见,完善的基础设施、良好的生态环境,为社区内在活力的营造创造良好的条件,奠定了社区发展的坚实基础。UPI

注:未标明资料来源的图表均为作者绘制或拍摄。

感谢同济大学杨贵庆教授与宋代军博士在论文撰写过程中的指导;感谢编辑王枫老师对论文的编排完善。

参考文献

- [1] 赵润江,赵鸣.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海南美丽乡村规划设计思考——以三亚为例[J].建筑与文化,2015(3):114-115.
- [2] 杨贵庆,刘丽.农村社区单元构造理念及其规划实践——以浙江省安吉县皈山乡为例[J].上海城市规划,2012(5):78-83.
- [3] 曾旭正.台湾的社区营造[M].台北:远足文化出版社,2007.
- [4] 丁康乐,黄丽玲,郑卫.台湾地区社区营造探析[J].浙江大学学报(理学版),2013,40(6):716-725.
- [5] 翁政凯,许国威,等.从可持续发展模型中探讨台湾农村社区发展策略的研究[J].建筑学报,2007(特辑):73-75.
- [6] 刘健哲.台湾之农村社区更新[J].台湾农业探索,2005(2):7-10.
- [7] 萧宇佳.乡村社区永续发展——以新竹北埔聚落为例[D].台湾国立中央大学,2010.
- [8] 廖俊松.非盈利组织与福利社区营造——龙眼林社区之经验分析[J].环境与艺术期刊,2006(4):81-94.
- [9] 江大树.台湾乡村型社区的发展困境与政策创新:桃米生态村的社区重建经验启示[J].政治学报,2003(36):1-26.
- [10] 仇保兴.生态文明时代乡村建设的基本对策[J].城市规划,2008,32(4):9-21.

(本文编辑:王枫)

(上接 110 页)

- [79] TEWDWR-JONES M, THOMAS H. Collaborative action in local planning: planners' perceptions of 'planning through debate'[J].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B: Planning and Design, 1998, 25(1): 127-144.
- [80] TURING A M. "On computable numbers, with an application to the Entscheidungsproblem" [J]. Proceedings of the London Mathematical Society, 2(42), 1937: 230-65.
- [81] ULAM Stanislaw. Science, computers, and people: from the tree of mathematics[M]. Boston: Birkhauser, 1986.
- [82] VON NEUMAN J, MORGENSTERN O. Theory of games and economic behavior[M]. US: Princeton Univ. Press, 1944.
- [83] WAGENAAR H. Meaning in action: interpretation and dialogue in policy analysis[M]. New York: M. E. Sharpe, 2011.
- [84] WARD S. Planning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the advanced capitalist world[M]. London: Wiley, 2002.
- [85] WU N, SILVA E. Surveying models in urban land studies[J]. Journal of Planning Literature, 2012, 27: 139-152.
- [86] WU N, SILVA E. Selecting an urban models using waves of complexity[J]. Urban Design and Planning, 2013, 166(1): 76-90.
- [87] YANOW D, SCHWARTZ-SHEA P, eds. Interpretation and method: empirical research methods and the interpretive turn[M]. New York: M. E. Sharpe, 2006.
- [88] YIN R. Case study research[M]. Thousand Oaks: SAGE, 2009.

(本文编辑:许政)